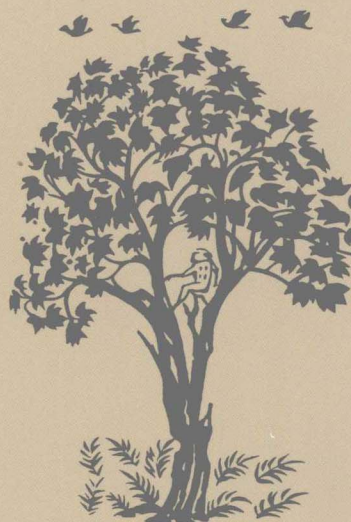


民国山东

四大教育家研究

● 马德坤 张晓兰 著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

马德坤 张晓兰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马德坤,张晓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309-08520-4

I. 民… II. ①马…②张… III. ①鞠思敏(1872~1944)-人物研究
②范明枢(1866~1947)-人物研究③王祝晨(1882~1967)-人物研究
④于明信(1882~1948)-人物研究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585 号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研究

马德坤 张晓兰 著

责任编辑/杜荣根 戴文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字数 149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20-4/K·358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产生的时代背景	1
第一节 清末历史变局	1
第二节 清末教育改革	8
一、教会教育	9
二、洋务教育	16
三、维新教育	22
四、清末新教育	26
五、晚清山东教育	31
第二章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的生平	36
第一节 鞠思敏的生平	36
一、家世与教育	36
二、投身革命	42
三、兴办教育	46
四、反帝爱国、支持学生运动	56
第二节 王祝晨的生平	65
一、家世与早期教育	65
二、外出求学	69
三、投身教育	72
第三节 范明枢的生平	79

一、家世与教育	80
二、振兴教育	86
三、抗日救国	99
第四节 于明信的生平	111
一、家世与教育	111
二、投身教育	113
第三章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119
第一节 鞠思敏的教育思想	119
一、教育救国思想	120
二、教育改革思想	122
三、无不可教育之人,无不可造就之才	129
四、重视乡村教育	130
第二节 王祝晨的教育思想	133
一、教育实践活动	133
二、教育思想	142
第三节 范明枢的教育思想	167
一、教育救国思想	168
二、教育改革思想	170
三、重视劳动的思想	176
四、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178
五、乡村教育思想	180
第四节 于明信的教育思想	182
一、教育救国思想	183
二、家庭教育思想	184
三、无为而治的学校教育思想	187

第五节 山东四大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特点	188
一、开放性	192
二、超前性	194
三、实践性	195
四、全面性	196
第四章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的历史贡献	199
一、推动了山东教育观念的更新	199
二、推动了山东教学方法的改进	202
三、推动了山东教育体制与教学内容的改革	203
四、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	205
五、奠定了地方志研究的基础	206
参考文献	209
后记	215

第一章 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 产生的时代背景

活跃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山东教育界的鞠思敏、王祝晨、范明枢、于明信,为发展山东近代的中学教育和师范教育,鞠躬尽瘁,奋勉淬励,被齐鲁人民誉为“四大教育家”。众所周知,任何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杰出人物来解决这一时代的某项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杰出人物是历史造就的,是时代的产物,其出现有着历史必然性。鞠思敏、王祝晨、范明枢、于明信这四位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在近代的产生也绝非偶然,他们既是清末山东教育改革的受益者,又是近代山东新式教育的铺路人,他们的出现有着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清末历史变局

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四大发明、万里长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丝绸瓷器、宫殿园林、班超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等等,无不向世界展示着大国的风采和

强国的辉煌。然而,封闭在山海之间、沉迷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的中华帝国,在进入康雍乾盛世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衰相尽显、危机四伏,而且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而来的鸦片和洋务,更是给这个动荡、多难的王朝增添了诸多不安的因素。

就在清贵族纵马入关,荡平四字,建立大清帝国,开创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资产阶级率先冲破了中世纪的樊篱,踏上了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美国、法国、沙俄紧随英国之后,依赖政治革命起步,借助工业革命扬帆,造就了比中华帝国更为强大的世界,从而在近代历史上领尽风骚。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原料,因而拓展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②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且颇具市场潜力的中国,对欧美资产阶级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事实上,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将中国描绘为遍地黄金的乐园时,她就成了西方国家垂涎三尺的目标,腐朽不堪、满目疮痍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势力的发展与殖民面前,遭遇着空前严重的挑战。

1840—1842 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进行的首次较量,1840 年 4 月,英国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2 页。

了支付军费案,派兵侵略中国。“6月,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4000余名士兵、540门大炮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敦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①。尽管在本土进行自卫战的中国疆域辽阔、兵源充足、物资供应便利,但还是惨败于水土不服、军需供应困难的英国,并被迫订立了城下之盟,割地、赔款、通商……不甘落后的欧美其他国家,也争相前来要求订约,腐朽的清政府竟一律允准。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铭刻了古老中国在“船坚炮利”威逼下,被迫打开国门,走入近代的第一步,可以说,鸦片战争的炮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自此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了落后挨打的苦难历程,中国社会性质随之发生了巨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

千古未曾有过的奇变促使中国人从迷梦中醒来,一些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在抛弃繁琐空疏、无以济世的汉学、宋学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学习西方、强国御敌之上。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魏源则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早期代表,他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为了达到师夷救国的目的,魏源还向科举考试发起了猛攻,他认为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科举教育,“专以无益之画饼,无

^① 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9页。

用之雕虫”的学问,培养“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①的庸才,如果想要挽救国家的危亡,清政府必须革新科举考试。

然而,鸦片战争后的严峻形势,以及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并没有让清政府幡然醒悟,他们没有总结经验,没有接受教训,依然麻木不仁,依然妄自尊大。当西方列强为着更多利益卷土重来、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清政府依旧毫无招架之力,再一次地丧权辱国,再一次地割地赔款,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此后,外国侵略者凭借着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特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向中国展开了全面进攻,猛烈地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秩序,这迫使有识之士们开始寻求新的对策,探索新的出路。

林则徐之徒冯桂芬,在肯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以中国之名教伦常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②,那么,西方人的富强之术有哪些呢?冯桂芬认为,除了军事工业之外,“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皆得格物致理。舆地书备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③,为此,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然而,中国的科举考试及与之相应的传统教育,却“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就天下之才”,如此腐朽空疏、无以济世的制度,“断不可复以之取士”^④。

① 《魏源集(上册)》,第37页,转引自:白寿彝,《中国通史(近代前编·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页。

③ 同上。

④ 金其桢主编:《近代三大实业教育家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此外,在“学西方”、“制洋器”问题上,冯桂芬还特别强调中国自己掌握新技术,“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转漕,而一日可令我饥饿;以之运盐,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复溺——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固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固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①

在开明知识分子不断呼吁变革科举、学习西方之时,清王朝内部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封建官员也开始调整步伐,改弦易辙。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与交往中,他们逐步意识到“天朝上国”再也不是无所不能了,正如清朝重臣李鸿章所言,“鸿章常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细,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②。因此,这些开明官员主张“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③……于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除了建立军事工业、创办民用企业、编练新式军队外,洋务派还效法西方,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以培养洋务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可以说,洋务派的上述举措,在揭开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序幕的同时,也冲击了日益腐朽、空疏、无用的科举考试以及与之相应的科举教育,此后,新式教育逐渐登陆华夏大地,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清王朝的洋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丁酉聚丰坊校刻本,第74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第46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第34页。

务运动,却因依托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些矛盾,最终宣告破产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就是洋务运动终结的丧钟。事实上,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天皇就制定了对外扩张的政策,并不断向朝鲜半岛渗透,以为日后侵华埋下伏笔。1893年,日本又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窃取政治军事情报,至此,日本做好了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1894年春,朝鲜半岛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借此机会设下圈套,诱使清朝出兵,从而挑起了中日战事。

尽管朝鲜半岛的中日军队旗鼓相当,但由于太后一党力主妥协、“避战自保”以及部分将领腐化堕落、贪生怕死,结果,华夏神州惨败于东洋岛国,并无奈地签下了屈辱丧权的《马关条约》,该条约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权益的均势,与此同时,泱泱大国向蕞尔小国割地求和的现实,加速膨胀了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于是,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令人痛惜的是,积弊已深的清政府此时却无力挽回颓势,在列强威逼下步步退让的中国,很快陷入了“瓜分豆剖”的危局中。

甲午之战,“天朝大国”的败北以及战后的危难形势,促使早已蓬勃兴起的维新思想迅速传播开来,接踵而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们认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中国要想摆脱危局、走向富强,就必须改良教育、兴办西学,正如梁启超所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

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康有为也指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②,“科举不改,积重如故”^③。

正因为如此,维新派在整个戊戌变法运动中,始终将变革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为了扫清“兴西学”的障碍,他们不仅强烈谴责八股取士的危害,还尖锐批判了洋务教育的弊端,“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辽、台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④,“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中体西用)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⑤。

维新派为救亡图强而奔走呼号的行为,最终打动了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深感“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⑥的他,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广开学校,引进西学。尽管这场变法运动仅仅维持了百余天,但它对唯科举考试马首是瞻的封建传统教育,以及“只学(西学)皮毛”的洋务教育的猛烈抨击,却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剧烈的反响,从而推动着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②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9页。

③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

④ 《康南海自编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1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⑤ 严复:《救亡决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68页。

⑥ 《康南海自编年谱》,《晚清名儒年谱》,第1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了近代。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它不仅打乱了中国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还强行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时代。不过,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而来的西学,以及资本主义入侵引发的民族觉醒,使近代中国迈开了融入世界主流的第一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考试,及与之适应的封建传统教育,随之被近代化的教育体制所取代。

第二节 清末教育改革

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政治控制以及经济掠夺,西方的思想文化也逐渐入侵并渗透到了中国,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就通过修教堂、建学校、办刊物等方法,不断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鸦片战争之后,大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从通商口岸进入了中国腹地。为了实现“基督教占领中国”的目标,他们纷纷在中国办起了学校,可以说,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灌输奴化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麻痹群众斗志的“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它最终的目标是要将中国人民培养成列强侵略中国的奴仆,从而实现他们将中国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罪恶目的。

可见,近代传教士是西方文化入侵的急先锋,而教会学校则是西方文化入侵的重要手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渗透和发展,西方教会兴办的各类学校,几乎遍及了中国的各个地方,教

会学校的广泛设立加速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但它也让封闭的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的教育观念和教学体制。自此之后,教会学校成了中国有识之士学习西方的“样本”,这使得中国的近代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强行介入下开始孕育新的曙光。

一、教会教育

近代中国的教会教育是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产物,有着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背景。1842年8月29日,中英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人趁火打劫,采用军事讹诈的手段,强迫清政府“一视同仁”,接受其拟定的条约草案,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正式签订了《望厦条约》,规定“美国人有权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建立教堂,开设医院”。不甘落后的法国人在炫耀武力的同时,也提出了援引英法先例、订立条约的要求,1844年10月24日,受到胁迫的清政府与法国正式签订了《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及坟地”,“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这样,清政府在武力恫吓下被迫放弃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并承担起了保护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责任,不久之后,法国又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基于“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一条款,西方各国相互援引,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利。可以说,传教布道成了外国侵略势力进入中国腹地的强有力武器,自此之后,外国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乘坐着贩卖鸦片的商船或入侵中国的军舰,不断地从各通商口岸涌入内陆城市,甚至人迹罕至的穷僻之地,其传教活动也更加有恃无恐,

更加肆无忌惮,传教规模的不断扩大,反过来又使得在华传教士的数量日趋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845年进入中国的男传教士计31人,至1874年已达到436人^①。

由上可见,近代来华的传教士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尽管他们有些人是狂热的宗教传播者,来华的动机也仅仅是出于传教使命,但在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即使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过贡献的传教士,也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先锋、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更不用说那些别有用心传教士了。因为有了各项特权的保护,他们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直接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抢劫及血腥镇压,可以说,这些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传教士,在中国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恶行。

比如,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派,在中国刺探政治、军事情报。鸦片战争打响之后,他不仅担任了英军总司令的翻译,还直接参与了《南京条约》的起草与谈判;再如,美籍传教士伯驾成功游说美国政府来华索取权益后,以其开设的博济医院为掩护,不断向美国使团提供中方情报,以有针对性讹诈中国,从而迫使其就范。此外,在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伯驾还利用自己曾救治过中方代表潘仕成父亲这一点,掌握了中方代表团的详细资料,从而帮助美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权益,可以说,伯驾是美国侵华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也是美国获得更多特权的“功臣”。

除此之外,外国传教士还采用欺诈、强占、压价等方式,霸占土地、修建教堂、强行传教,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可以说,

① 金忠明:《中国教育史汇通》,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与屈辱丧权紧密联系的传教活动,以及传教士从事的不法勾当,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与抗争,再者,清政府素以“天朝上国”自居,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既不承认“蛮夷”的平等地位,也不屑于同“蛮夷”交往接触,所以,来自异国他乡的传教士,尽管源源不断地涌入了中国腹地,却很难被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接纳。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基督教占领中国”,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站稳脚跟,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如何才能打开传教事业的局面,实现文化控制中国的目的呢?深谙中国事务的传教士们意识到,中国人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尽管他们可能很排斥异教,却十分愿意接触学者,这或许将会是传教士融入中国社会的突破口,正如传教士法思远所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信奉教育,尊重学者。掌握古代的经典和文学的知识,对于那些希望升入学者行列的人是十分重要的,他被看成是有学问的标志。”^①于是,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传教布道的同时,陆续创办了大批教会学校,以期做到“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摧毁异教堡垒和支持异教的信仰”^②。

鸦片战争后的20年时间里,教会学校多作为教堂的附属机构设立,规模不大,且多属小学水平。玛利逊学堂就是这一时期教会学校的代表,1839年11月,美国人布朗为纪念英国传教士玛利逊,在澳门开设了一所以玛利逊命名的小学,1842年11月,该校由澳门迁往香港,这所最早设立于中国的教会学校,是专门针对华人开办的,尽管它所设置的西学课程,开阔了

① 法思远,《山东》(英文),转引自:山东教育厅《山东教育通史》课题组,《山东教育通史(评议稿)》,2006年7月。

②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